

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研究*

计军恒¹, 王立梅²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杨凌 712100; 2.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 100091)

摘要:扩大农民政治参与, 利于解决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矛盾, 有助于保持全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运转。本文从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探讨了现阶段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从而提出扩大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中国农民; 政治参与; 制约因素; 对策

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5)06-0074-03

The Limited Factors of the Farm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t Present in China

Ji Jun-heng¹, Wang Li-mei²

(1. Northwest Sci-Tech University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Yanglin 712100, China;

2. Central Party School,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Extend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farmer benefits the solution of the countryside conflicts in politics and economy. It is also beneficial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normal revolving.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limited factors of the farm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t present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bout the problem.

Key words: Chinese farm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limited factor; countermeasures

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或公民团体为实现其政治权利,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 影响政府活动的行为。政治参与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精髓, 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 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举足轻重。农民政治参与是指我国农村成年人口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及其运作的行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有了较大增强, 政治参与水平也有所提高, 但由于种种原因, 从总体看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探讨其制约因素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将有助于扩大农民政治参与, 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一、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分析

罗伯特·达尔的政治分层理论认为, 从制度化分层角度看, 在任何社会中, 都可以找到一个在政治上地位最低、同时与政治没有任何制度化联系的阶层。这就是无政治阶层。在大多数社会中, 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无政治阶层。据此, 我国农民阶层可以归属于无政治阶层。在政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的现代社会, 农民为什么不关心政治呢? 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为何不高? 总体来说, 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贫穷是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的首要因素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指出: “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 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在贫穷的基础上, 农民不可能对政治参与抱有很高的热情。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农村, 自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 农民收入也确实有所增加。但是, 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拉大, 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依然处于贫困状态。2004年, 我国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2936元, 在这一数字的基础上, 农民为维护生活所必需的支出却有增无减。以供养子女读书为例, 供养一个大学生的平均费用需要花掉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 这还不包括子女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所需要的支出。还有一种更糟糕状况, 有些农民的孩子大学毕业后无法就业, 这更加大了农民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农民用最朴实的语言来说明自身的经济状况, “吃是够了, 但有个天灾人祸, 一家人就会陷入绝境”。为了支撑家庭, 大多数农民在农忙时节务农, 农闲时节到城里打工, 终年劳作。格尔哈德·伦斯基指出: 日常生活的压力严重限制了人口中绝大多

* 收稿日期: 2005-08-10

作者简介: 计军恒(1975-), 男, 陕西兴平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项目管理与投资经济学研究。

数人的政治活动。虽然在革命时期,大多数人可能在短期内在某一重要的领域中变得在政治上活跃。但是由于必须要保证其生计,所以大多数人很快就离开了政治领域。^[2]沉重的日常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是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最主要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这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主体意识缺乏是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

农民政治参与主体意识是指农民以主人翁的态度和责任感积极参与到政治中来。我国的村民自治旨在逐步培养农民自主、自立意识,使农民以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感充分行使国家赋予的种种权利和承担相应的各项义务。但在实践中,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参与意识非常淡薄。我国农民缺乏政治参与主体意识,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第一,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主要指人们对社会政治的心理取向,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对政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史中,从周秦到清末的文化,均属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范畴。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线的政治文化。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公平竞争意识、尊重知识的传统等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传统政治文化中一些不合时宜的内涵,如圣人掌权心理、全角色化心理、清官依附和归属心理、“与世无争”、被动参与等这些政治伦理观,至今还深刻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抑制了农民政治参与主体意识。第二,封闭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几千年来来的小农经济模式,呈现出封闭性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发展状态。近乎原始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在自家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生产劳动。农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基本活动也几乎均局限于村落之中。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农民都是将多余的农作物卖掉,换得现金用于缴纳税费、给孩子交学费、购买生活用品和农用物资等等。农闲时节,农民们走亲访友,打听消息,简单的娱乐集会,这些活动也都基本上局限于自家附近的村镇。在这样封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基础上,农民追求的是“一亩地三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自觉政治离自己很远,政治参与缺乏内源性动力。

(三)具体参与制度不完善是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

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需要凭借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进行。我国已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等许多基本政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农村村民自治是农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载体,但是在贯彻执行的实践中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一是人代会的民主程序造成农民参政议政不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自治州、县、自治

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换言之,即四个农民拥有的人大代表数等于一个市民拥有的代表数。在各级人代会中,不仅农民代表所占比例相对较少,而且农民代表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精英,由此,普通农民的意愿和心声难以被充分表达。二是作为农民参政议政最重要载体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村民自治的组织结构主要包括村民会议和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全体成年村民组成。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也是村民会议的执行机构。但是,有些落后地区的村庄从来不召开村民会议,涉及村民利益的大事小事一律由村民委员会决定,甚至由村支书一人说了算,村务也不公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落实不到位。此外,一些地方不能正确处理基层群众组织与党组织的关系,往往出现党组织代替自治组织的现象,民主自治的功能不健全、职责不明确,在实践中不能真正体现出“民主自治”原则。具体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在实际中的偏颇必然阻碍农民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抑制他们管理国家、当家作主的积极性。

二、扩大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建议与对策

政治参与能够强化政治体系的传导和反馈机制,利于政治体系迅速做出理性决策,及时解决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机制中的矛盾和问题。扩大农民政治参与,不仅利于解决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更有助于保持全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运转。鉴于以上制约因素,笔者认为扩大我国农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社会地位

一要增加农民收入。经济是基础,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高度发展的政治民主。科恩曾说:“严重贫困的群众,根本无法获知参加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进行有效率的组织,并接触他们的代表。”^[3]农民只有在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彻底摆脱贫困,衣食无忧的条件下才可能以更大的热情参与到政治中来。增加农民收入有多种渠道,主要途径是靠国家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如近年来实行的减免农业税和农业返补政策,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相关问题,但已初见成效。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民进行政治参与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二要保护农民利益。马克思曾讲过,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理应以实现和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为目标。但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利益往往最容易受到侵犯,如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并没有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缩小,却出现了逆向变化;部分地区的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甚至超过了农民自身的承受能力等问题。农民为革命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深入研究,从实际出发制定

一些更具针对性的农村政策,切实尊重和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三要提高农民社会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之本。然而,农民社会地位的低下与农业生产地位的重要性形成了鲜明反差。社会经济结构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农业生产,却由被人视为最不重要的社会成员——农民去完成。这种二律背反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农民终年辛勤劳作,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农民的职业是神圣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应从自身做起,并且教育自己的后代要尊重农民,尊重农民的劳动,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

(二) 增强参与主体意识,提高农民参政议政能力

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与他们的参与意识和基本素养密切相关。增强农民的参与主体意识,首先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因为有健全的认知技巧,学历高的公民政治关心程度也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着教育和政治参与的关系。”^[4]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增强农民政治参与主体意识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在具备条件的县级市或乡镇可以考虑建立农民夜校,免费为农民提供接受再教育的环境和条件。夜校至少应承担以下几项教学任务:一是初级任务,即扫盲。二是对农民进行政策培训的同时,加强对农民参与意识、公民意识等现代政治思想的教育和灌输,使农民自觉摒弃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从而提高农民对政治参与的兴趣。三是教农民学习英语和计算机的基础知识,以便于农民掌握和应用进行政治参与必不可少的工具,增强农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其次,发挥大众传媒导向作用,强化农民政治参与的心理动机。心理动机直接关系到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德国心理学家勒温提出了行为函数 $B = f(PE)$,其中 B (Behavior) 代表行为, P (Personality) 代表心理特征, E (Environment) 代表环境^[5]。上述函数显示,个体行为是一定环境下对心理刺激的外在反应,同样,政治参与行为是个体所处环境和心理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农民政治参与方面,大众传媒有必要多报道一些农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并成功维护自身或团体利益的事件。农民是最现实的阶层,由于经济条件、生活现状及以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最关心、关注眼前的现实利益。农民政治参与的直接心理动机来源于对具体的利益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利益要求。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我们要让农民看到:积极的政治参与不仅能切实有效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当农民切身体验到积极的政治参与带给他们的益处时,他们必然踊跃参与国家政治事物和地方政治事物的管理,农民政治参与主体意识会在参与过程中逐步增强。

(三) 完善具体参与制度,拓宽农民参与渠道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一定要有具体的制度载体,只有健全农民的政治参与机制才能满足农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利益表达要求。第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程序。在人大代表中应增加农民代表的比例,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必须增加不同农民阶层代表的比例。经济条件不同的农民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各级人代会中的农民代表多数都是带头致富的农民精英,他们并不能完全反映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的意愿和心声。在各级人代会中增加不同阶层农民代表的比例,利于保证农民中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其代表来参政议政,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最为重要。第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须认真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进一步完善选举规则和程序,引导和保证农民为自己选出真正维护自身利益的管理者和代言人。此外,村民大会应定期召开,凡村内重大事务一律交由村民大会集体讨论,民主决策,村务状况尤其是财务收支帐目应在村民大会上加以公开,让全体村民进行监督。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途径,真正体现村民“民主自治”的原则。第三,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建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农民协会。目前我国,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惟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现在离群孤立,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6]这是农民利益容易被忽视和遭受侵犯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民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参与和维权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改变农民“一盘散沙”的状况。建立“农民协会”等专门化的农民组织,利于增强农民的组织性和自我保护能力,更有助于引导农民通过制度化渠道有序、有效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
- [2] 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70.
- [3] 科恩. 论民主[M]. 聂崇信,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11.
- [4] 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5] 俞文钊. 管理心理学(第2版)[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228.
- [6]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322.